

清代考據學

孙钦善 著



中华书局

清代考據學

孙钦善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考据学/孙钦善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12
ISBN 978-7-101-13584-8

I.清… II.孙… III.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IV.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498 号

-
- | | |
|------|---|
| 书 名 | 清代考据学 |
| 著 者 | 孙钦善 |
| 责任编辑 | 徐真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584-8 |
| 定 价 | 69.00 元 |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清代考据学的名称、实质和内涵	2
二 清代考据学的特点	7
第二章 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	10
一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对明代空疏学风批判的 直接结果	13
二 清代考据学是对中国考据学悠久历史传统的 继承	16
三 清代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务实学风选择了考据 学并促进其发展	21
第三章 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	26
一 清代考据学的分期	26
二 清代考据学的派别	36
第四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一:传统小学·文字	57
一 清代考据学者既宗奉《说文解字》而又不迷信	57
二 清代《说文》四大家	60
三 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研究、补正《说文》	76
第五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二:传统小学·音韵	83
一 继承传统,进一步明确语音的历史变化,彻底 破除“叶韵”说	83
二 对古韵的考证方法日益全面,对古韵系统的 认识不断加深,古韵分部渐趋精密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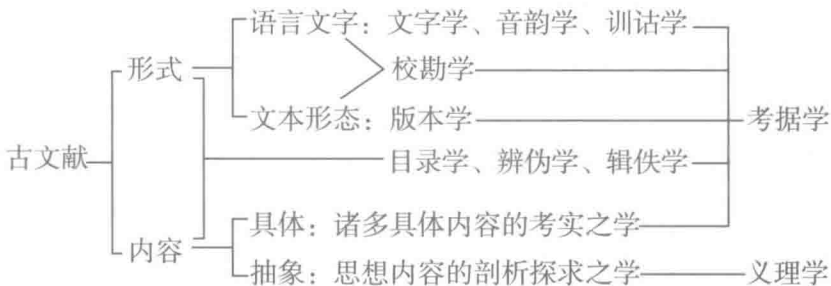
三	关于古声纽的研究	120
第六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三:传统小学·训诂	127
一	因声求义,彻底走出“望文生义”的误区	127
二	通贯群书,随文释训以确定字义	158
三	字义辨析更加细致、精密	160
四	归纳通例,演绎以求	162
第七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四:目录学	171
一	目录成果丰富多彩,水平高超	172
二	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199
第八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五:版本学	214
一	清代考据学在版本鉴别上的成就	216
二	清代考据学在版本源流系统考证上的成就	228
三	清代有关版本学的专著	233
第九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六:校勘学	239
一	清代考据学者对校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 空前的高度	240
二	清代考据学者对古文献致误的原因有更加 清醒的认识	240
三	清代考据学者校勘方法全面,运用灵活	248
四	关于段玉裁与顾广圻校勘论争的启示	279
第十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七:辨伪学	288
一	关于清代辨伪前后两峰、中间一谷的态势	288
二	清代辨伪学在辨伪方法上的贡献	314
第十一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八:辑佚学	346
一	清代辑佚发展的缘由和阶段	346
二	清代辑佚考证严谨,方法全面,成果质量	

空前提高	371
第十二章 清代考据学成就之九:古文献内容考实	378
一 清代古文献内容考实发展概述	379
二 清代古文献内容考实的特点和方法	400
第十三章 清代考据学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415
一 对清代考据学作总体评价,确定其历史地位, 离不开比较	415
二 清代考据学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可以从 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的有关评价及其所受 影响的视角观察	428
三 清代考据学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还可从 海外汉学家的汉学研究情况的视角观察	452
四 清代考据学的珍贵价值及其存在的历史 局限	467

第一章

绪 论

考据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了解考据学,必须对古文献学的全部内容和结构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一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文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文献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事、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紧密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诸学(其中目录、辨伪、辑佚等亦与内容有关)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为求明晰,兹图示如下:



由以上可知,考据学在整个古文献学中占据的比重很大。不仅如此,它还是科学探讨义理的先决条件,这已为古文献学史的丰富经验所证明。

考据学不始于清代,它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孔子的无微不信、多闻阙疑。至汉代已经有考据与义理相对应的明确观念,一直延续下来。清代考据学集古代考据学之大成,发展为一个高峰。关于清代考据学与前代考据学的继承关系,后面在探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内在学术原因时,将会具体谈到。

一 清代考据学的名称、实质和内涵

考据学在清代就是一个习用的名称,虽然焦循对此有疑义,说:“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惟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不谓近之学者,专执两君之言,以废众家,或比许、郑而同之,自擅为考据之学,吾深恶之也。”(《理堂家训》卷下)此话旨在反对拘守门户,有它的道理,但对“考据”这一术语毕竟是一种偏狭的理解,不足为据。其实通常所言考据的“据”就是证据的意思,并不是专据某家的意思。焦循又说:“自有考据之目,依而附之者有二,一曰本子之学,宋相台岳氏集二十三本以校九经,此其嚆矢也;一曰拾骨之学,其书已亡,从类书中鸠灌而出,若王应麟之《诗考》、《郑氏易》是也。是二者,富贵有力之家出其余财延集稍知文者为为之,亦贤于博奕,亦足备学者之参考。若一生精力托此为业,唯供富贵有力者之使,令为衣食糊口计,倘认此为经学则非也。……人各有所近,高下浅深必难一致。本子、拾骨之学,非不可为,特非经学之尽境尔。若习为高论,鄙弃一切,而高深之地究莫能窥测,浮而无实,尤所切戒。譬如树五穀者,务去萑稗,刈蒿莱,乃蒿莱可以供爨,萑稗尚以救荒,若一味去之、刈之,而不树五穀,恶乎可也。”

(同上)焦循这里的话,把考据学与义理学相对而言,有其精辟之处,但把考据学的内涵仅限于版本校勘学和辑佚学,理解亦不够全面,且对考据学有过分轻视之嫌。

考据学还有种种名称,并不统一。

有的称汉学,是与宋学相对而言的。其实汉学不是指有汉一代之学,而是指以汉代古文经学为代表的考据学,宋学也不是指有宋一代之学,而是指以宋代理学为代表的义理学,如吴派代表学者惠栋之父惠士奇自家红豆山房楹帖所写“六经尊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前记》)。后来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以汉学指称考据学,为不少人所沿用。其实“汉学”一词,并不准确,当时龚自珍就曾提出质疑,写了《与江子屏笺》,说:“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短订,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噩噩无一切语弊矣。”(《龚自珍全集》第

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有的称朴学,如洪亮吉《邵学士家传》:“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徵君若璩首为之倡。”(《卷施阁文甲集》卷九)梅曾亮《十经斋文集序》:“人以先生邃于经而工于文,异乎朴学之士。”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四:“乾嘉钜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肆篆籀,家耽《苍》《雅》矣。诂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碣,又渐而搜及古专(砖),谓可以印证朴学也。”又龚自珍《己亥杂诗》:“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尔翁啜九流。”(《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姚锡钧《论诗绝句》:“放言高论陈同甫,朴学奇才纪晓岚。”等等。《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也常用朴学一词。朴学之称一直沿用到近现代,如章炳麟《检论·清儒》中屡用。又如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说:“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又如美国学者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亦用其称。其实朴学一词,汉代就有了,如《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世沿用其义,以指朴质、朴实的考据学。

有的称制数,见于戴震著作,如《与方希原书》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当作义理,见下文),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东原集》卷九)制数指典制、度数的考据之学,在其他文章中,戴震把义理、文章、考核三者并提,制数正与考核相应。

至于把考据称考证、考覈或考核,则为同义词,对各家有关说法不再一一引述。

清代考据学虽然名称繁多,但其内涵和实质无异,即指对与义理

相对应的如前所述古文献形式的各个方面和内容的具体方面的考实之学。如果要加以界定,它与考古学相关而又有别,所谓“相关”指可以互相印证,所谓“有别”指考察的对象有根本区别,即考古学考察的对象是古代文物和遗迹,考据学考察的对象是古文献,而且仅仅是古文献中与义理相对应、不包括义理的部分。关于此,清代学者的观念是非常明确的,如前引陈康祺《燕下乡脞录》把“形声训诂”、篆籀《苍》《雅》、“诂经榘史”视作“朴学”即考据学,而把“考尊彝”、“访碑碣”、“搜古专”视作用以“印证朴学”的考古学。又如王鸣盛,把考据与义理对应、而把义理排除在治学范围外的观点更具有典型性,他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制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也。”以上谈的是治史,先后两次用“但当”一词强调考据,而把属于义理的“议论”“褒贬”排除在外。他还连及治经,认为与治史大同小异,如说:“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摩研排纆,二纪馀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之法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

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骈、颜师古一辈乎！其当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十分明显，他所谓的同，表现在考据方面，包括语言文字的校释、文本形态的考察和具体内容的考实等内涵，以及“务求切实”的方法和目的。在这篇序中，他还结合个人的经验、体会，对考据的内涵、方法和目的作了具体说明：“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亦多妄矣。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得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又如戴震，屡把考核（或称考覈，即考据；又称制数，见前）、义理、文章三者对举。文章属于表述的工具，此不论。至于把考据与义理对应，与其他考据家无异。而且他关于考据内涵的认识和论述最为具体、全面，如《与是仲明论学书》说：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官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

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其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槩，毫厘不可有差。（《戴东原集》卷九）

这里所谈的道，即义理；而与其相对应又未始相离的是考据，其内涵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具体内容方面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术、乐律等等。由以上言论，并与清人考据实践相印证，可以说清代考据学实际上是文献考据学，而且其内涵仅涉及文献的形式和具体内容，而与抽象的义理相对应。

二 清代考据学的特点

以上谈了清代考据学的名称和内涵，再来考察其特点。清代考据学的特点十分突出：首先，是内涵全面而以传统小学为中心，小学又以古音学为关键。关于内涵全面，在讲内涵时已经谈到，关于以古音为关键，后面讲小学时再具体论述，现在主要谈以小学为中心的问题。清代考据学以小学为中心，表现在多方面，第一，清代考据家多数都精通或重视小学，不少人是著名的小学家；第二，清代考据学以小学的成就为最高，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

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观堂集林》卷八)甚至可以说清代小学奠定了中国近、现代语言学的坚实基础,例如现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关于虚词的研究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王力认为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论王念孙);第三,小学成为考据方法的一部分,而且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顾炎武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按:指文字)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里把读古书与考订文字、考订文字与通晓古音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又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已见前)。这里不仅强调了小学在文献考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文字、音韵、训诂密不可分的关系。纪昀对戴震的小学成就及其对考据的影响评价很高,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钱大昕也是小学成就极高的考据家,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小学考序》)与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又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家学相承,都是以精通小学见长的考据家,龚自珍在《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中曾转述王引之的话:“自珍爰述平日所闻于公者曰:‘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龚自珍全集》第二辑)“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准确道出了王引之考据

学的特点;如果把“经”扩大到“经、史、子”,那又是王念孙考据学的特点;而“用小学”属于方法,则是他们父子的共同特点。阮元《经义述闻序》说:“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这是从清初到乾嘉时期以小学为中心的考据学历史的简括总结,相当精要。至于晚清的考据学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古文献学家俞樾、孙诒让,都是继承乾嘉传统,特别是以继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相标榜的。如俞樾《群经平议自序》说:“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焉。……余之此书,窃附王氏《经义述闻》之后,虽学术浅薄,倘亦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孙诒让说他自己“年十六七,读江子屏(藩)《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元)公所集刊《(皇朝)经解》,始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认为“我朝朴学超轶唐宋”,十分景慕“乾嘉诸先生”,“深善王观察(念孙)《读书杂志》及卢学士(文弼)《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札迻序》)。其次,清代考据学集古代考据学之大成,发展成一个高峰。复次,清代考据学本身发展迅速,特别是小学方面文字、音韵、训诂的进步,尤为突出,参见第三章《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

第二章

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

关于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前人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涉及到的不外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包括清王朝以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政策和以兴科举、倡修书为表现的怀柔政策;一是经济原因,即以“康、乾盛世”为代表的具备有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以经济繁荣发展为基础的丰腴物质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学术原因,包括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空疏学风的否定和对历史上考据传统的继承,等等。当然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不拘泥于一点,而能照顾到各个方面,这是对的;但是在讨论什么是主要原因时,总是产生较大的分歧。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晚清改革、改良、革命派批判或反满思潮和近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政治决定论”的影响,“政治原因为主说”总是占据上风。例如晚清具有批判、改革思想的龚自珍,在《咏史》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全集》第九辑),前一句恰好说明高压政策硬的一手的作用,后一句恰好说明怀柔政策软的一手的作用。又如辛亥革命派人物章炳麟,在《检论·清儒》中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馀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桎;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能,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蹠善矣。”(《章氏丛书》本卷四)再如梁启超完稿于1925年的《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它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也谈到学术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人人自危的高压政策。他还触及到考据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过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最终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高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观点，与此相同。大陆学术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前，这一类政治为主因的观点，由于和“政治决定论”合拍，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观点的主流地位开始动摇，但至今仍有影响，有的人仍在坚持（见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关于政治原因，我们的看法是既不能夸大，也不应抹煞。如果全面地客观分析，无论如何政治不能成为主因，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据学发展高峰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高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郑，百行法程朱。”（江藩《国朝汉